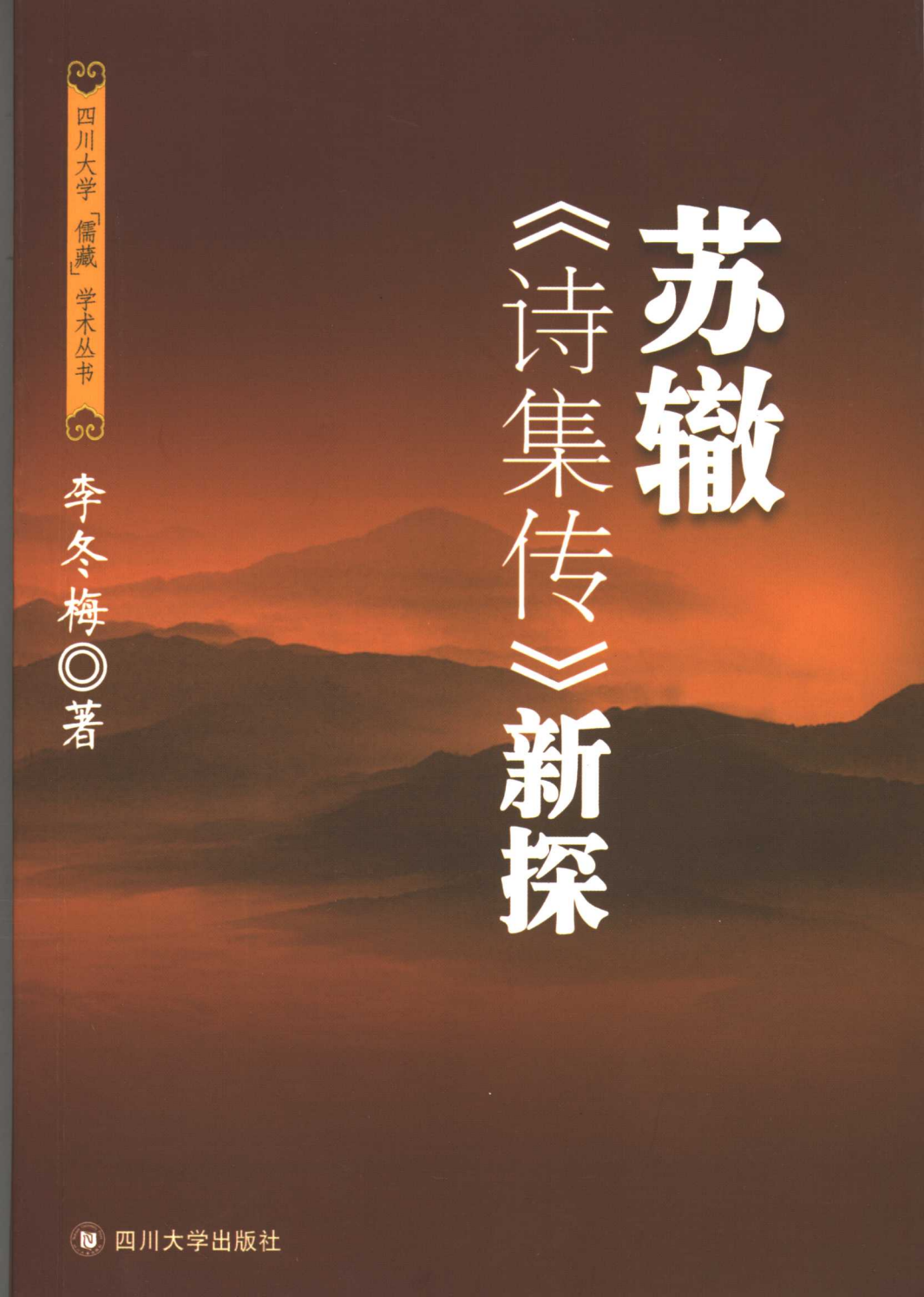




苏辙

《诗集传》新探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李冬梅◎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苏辙

《诗集传》新探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李冬梅◎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丁 丁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辙《诗集传》新探 / 李冬梅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1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ISBN 7-5614-3245-3

I. 苏... II. 李... III. 苏辙 (1039~1112) - 诗歌 - 学术思想 - 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335 号

书名 苏辙《诗集传》新探

作 者 李冬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四川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9.37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3 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一切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思想家。这在有着数千年“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传统的古老中国尤其如此。而一切有影响的思想家又常常是文学家。因为孔子早就说过：“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也。”

放眼古今中外的历史，真正称得上“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无一不是这样。屈原如此，柏拉图亦如此；司马迁如此，西罗多德亦如此；莎士比亚如此，曹雪芹更是如此……就是以“诗仙”、“诗圣”著称的李白、杜甫，以“散文八大家”著称的韩、柳、欧、苏（“三苏”）、曾、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一普遍现象决定我们在从事文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时，必须“艺”“学”并重、必须“文”“理”结合。倘若我们研究文学史，只注意文学家作品的艺术形式之美而忽略其思想内容之富，或是研究其思想而忽略其文学价值，不是买椟还珠的蚀本生意，就是质而无文的愚蠢行为。对于伟大的文学家，如果我们放弃其思想学术而不顾，甚至抛弃其学术著作而不理，那简直就等于舍其黄钟大吕而沉溺于里曲小调了。小调虽美，却非大雅正音，更

非天地正气。以为这样能真正把握作家的艺术造诣和思想内涵，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矣。

不幸的是，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我们却反复目睹着这一倚轻倚重的现象。我们不是唯艺术技巧是求而奢谈文学，就是虽然讲一点思想也是唯其进步或落后是问，而无视其美文中的思想和思想中的文美。因此文学史研究长期处于“一条瘦龙、两股青筋”的状态，仿佛不将文学史讲成斗争史，不将思想史讲得概念枯燥、兴味索然，就不会善罢甘休。对于“三苏”的研究也是这样，放眼成千上万的研究论著，我们几时将他们三父子当成富于文学的思想家或是富于思想的文学家来看待、来研究了？即或研究一点他们的思想，也是举着十倍、百倍的放大镜，纷纷去追寻佛教、道教等异端学说的蛛丝马迹，却将随处可见的孕育他们、滋养他们的儒学思想和儒家文化统统置于脑后，将他们一生呕心沥血著成的，平生自珍自惜、爱护备至的儒家经典的解读之书束之高阁。这不禁使人怀疑，这样研究“三苏”是对“三苏”的全面研究吗？用这一方法描绘出来的“三苏”形象还是本来的“三苏”吗？因此，在四五年前，我们在与“三苏”研究的著名专家、四川大学古籍所前任所长曾枣庄先生讨论如何把“三苏”研究推向深入时，认为有必要加强“三苏”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三苏”的经学著作的研究，并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上，作了具体规划。承蒙上下配合，诸生响应，数年以来，在苏轼《易传》、苏辙《古史》和《诗集传》的研究上，都有专著式的长篇文章，聊可补“三苏”研究之缺。在中国台湾地区，对苏轼的

《书传》、苏辙的《诗集传》也已经有了专门论述，目前只有苏辙的《春秋集解》和苏洵主撰的《太常因革礼》尚缺专题研究。近年来，这一情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一些一流大学也将苏辙的经学与学术成就纳入了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范围，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读者眼前的这本小书，就是这些成就之中比较耀眼的一份。

本书作者李冬梅，目前是四川大学古籍所在读的博士研究生，2000至2003年间又曾从我共学三年。她心性聪慧，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勇于创新。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她敢于将一个自己并不熟悉但却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展开了广泛的信息搜索和文本钻研，历经三个春秋，终于成此洋洋20万余字的论文。这篇论文，对苏辙《诗集传》既有传统经学范畴的研究，也进行了现代学术规范的探索。上述经学之盛业，下析思想之微旨，在经学、文献学、思想史、哲学史等领域，深入、广泛地进行了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超乎前人、信乎来者的成绩。因此当时参加论文评阅和答辩的诸位先生，一致给予了“优秀论文”的好评。

她阅读广泛，资料占有充分，特别是在苏辙文集已经前辈反复整理，苏辙佚文也一再辑补的情况下，还能发现两篇不为人知的佚文（《诗说》与《春秋说》），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两篇佚文后经我们共同考订，发表于《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毕业分配到待遇颇厚的某单位后，她还念念不忘自己已经开始并且十分钟爱的学术事业，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四川大学，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在新的起点上，她对旧作进行了新的思考和修改，使其更臻成熟和完善。李冬梅在读期间还发表了系列论文，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苏辙及其《诗集传》研究的。她的这些作品，也许结论与文笔都还显得稚嫩和不周延，但是她对“三苏”研究知之甚少，到目前已能把握研究动态，站在苏学研究的前沿进行专题讨论；从对《诗经》学史毫无所知，到目前已能就《诗经》学上的某些专题进行系统研究，并能上下贯通，左右逢源，集腋成裘，自成风范。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

今值四川大学“儒藏”工程向专题学术研究的纵深推进之际，我们组织了这套“学术丛书”。丛书中，既有名老专家的积年力作、平生精华，也有像李冬梅这样的学术新人的学术新作。这一安排，一见薪火相传、新老传带，此乃学术事业新新不已的传承规律，二亦表彰她专力学术、兢兢以求的治学精神。当然，本文确实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它的发表，倘能纠“三苏”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重文轻理”偏执现象于万一，就令本文作者和编者大喜过望了。如果本文尚有一二功夫为专家学者所取，自是作者本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如果其中还存在诸多未尽人意之处，则请咎其共学之师的失察之过。愿学人以慰勉后学之心，多赐教焉。更愿学人更多地关注“三苏”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的研究。如若那样，则本文即便当作引玉之砖也是可喜的。

舒大刚

2005年6月于四川大学古籍所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诗集传》的撰著、版刻及苏辙其他《诗》学著述考	(21)
第一节 《诗集传》的撰著过程	(21)
第二节 《诗集传》的版刻流传	(26)
一、两宋时期	(27)
二、元明清时期	(30)
第三节 苏辙其他《诗》学著述考	(37)
一、《诗论》	(37)
二、《〈既醉〉备五福论》	(42)
三、《诗病五事》	(44)
四、《诗说》	(46)
第二章 《诗集传》的经学成就	(53)
第一节 《诗序》观	(53)
一、《诗序》的称谓及大、小《序》的划分	(56)
二、《诗序》作者的辨析	(61)
三、《诗序》谬误的批驳	(70)
第二节 “二南”的分别	(83)

第三节	风雅正变说	(91)
第四节	大小雅的划分	(102)
第五节	《商颂》辨析	(109)
第六节	风雅颂的区别	(116)
第七节	诗篇命名	(124)
	一、对《郑风·大叔于田》名篇的分析	(125)
	二、对《小雅》四首诗名篇的分析	(128)
	三、对《荡》名篇的分析	(133)
	四、对《召旻》名篇的分析	(134)
第八节	《国风》解题	(137)
	一、《邶》、《鄘》、《卫》辨	(137)
	二、《魏风》辨	(143)
	三、《唐风》辨	(148)
	四、《豳风》辨	(149)
第九节	《国风》、诗篇的次第及篇什、章句的划分	(154)
	一、《国风》次第说	(155)
	二、诗篇篇次考	(163)
	三、《小雅》分什说	(168)
	四、诗篇章句的划分	(171)
第三章	《诗集传》的指导思想	(178)
第四章	《诗集传》的思想内涵	(190)
第一节	伦理、道德思想	(190)
	一、人伦关系	(191)
	二、道德修养	(196)
第二节	天命哲学思想	(200)
	一、无父感生说	(200)

二、天人宇宙观	(204)
第三节 政治思想	(208)
一、君道思想	(208)
二、君、臣、民关系论	(211)
三、治国之道	(218)
结 语	(227)
附录一 历代著录资料	(234)
附录二 20 世纪以来苏辙研究论著目录举要	(248)
参考文献	(271)
后 记	(286)

绪 论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对于它的研究，即使从孔子算起，也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诗经》学者数以万计，《诗》学著作无虑千种。其间流派众多，观点各异。按其学术特征分，《诗经》研究大致经历了汉学和宋学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体现自己特色的《诗经》学代表著作。苏辙的《诗集传》可以说是《诗经》研究由汉学传统向宋学传统转变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诗》学作品。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二十日，卒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月三日，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与父苏洵、兄苏轼并列于“唐宋八大家”之林，且以“三苏”之号名世。年十九，与兄同登进士第，后又同举制科，可谓少年得意。然仕途却相当曲折，熙宁新政中因政见不和，忤王安石意而出朝，辗转地方，沉沦下僚十数

年。又连坐其兄“乌台诗案”^①，贬监筠州盐酒税。哲宗立，高太后听政，召返京师，累官至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哲宗亲政，复见斥，贬居筠州、雷州、循州。徽宗继位，遇赦北归，寓居颍川，以大中大夫致仕。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谥号“文定”。

纵观苏辙一生，可谓宦海浮沉、颠沛流离，然其性沉静简洁，耿介不阿。《宋史》本传谓其“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梏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兼傅会，则此议息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摯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②。信为知言。

苏辙“天性高明，资稟浑厚。既有父文安以为之师，又有兄文忠以为之友”^③，故一生成就很高。其著作除《栞城》四集共九十六卷，主要代表其文学成就外，尚有《诗集传》二十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

①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知县苏轼因以吟诗“谤讪朝政”的罪名，被逮赴御史台（史称乌台）狱，随后供出作《山村》诗等文字寄与张方平的缘由。至十二月庚申（12月26日），朝廷责授苏轼为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其弟苏辙请“以所赐爵”为兄赎罪，故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其余有关人物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详参《宋史·苏轼传》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

② 脱脱等：《宋史》，卷339，中华书局，1977。

③ 刘大谟：《栞城集序》，见苏辙《栞城集·附录四》，1856页，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别志》二卷等，堪称北宋博学多能之士。于其文章，茅坤赞曰“冲和澹泊，道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棼错，云霞之蔽亏，日星之闪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①，王珩也说其“素称冲雅，不事艳丽”^②，刘熙载认为“小苏文一波三折”^③；于其政论，王十朋谓其“忠言嘉谋，耸动冕旒。横身政府，不避怨仇。棣萼联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识俱优”^④，邓光谓其“于政事书、条例司状，见公入朝之始，揆事中远，如汉贾谊。议河流、边事、茶、役法，分别君子小人之党，反复利害，深入骨髓，窃比之陆宣公赞”^⑤；于其史学，朱熹赞其《古史》“近世之言史者，唯此书为近理”^⑥，马端临也认为“子由晚节为学益精深”^⑦。而《诗集传》、《春秋集解》以及《栞城集》中的《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杂说九首》（《易说三首》、《洪范五事说一首》、《诗病五事》）和《进论五首》（《礼论》、《易论》、《书论》、《诗论》、《春秋论》），却颇能展现苏辙在

① 茅坤：《颍滨文钞引》，见《唐宋八大家文钞》，卷14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王珩：《栞城集序》，见苏辙《栞城集·附录四》，18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③ 刘熙载：《艺概》，卷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④ 王十朋：《苏颍滨赞》，见《梅溪王先生文集》，卷11，《四部丛刊》本。

⑤ 邓光：《淳熙本栞城集跋》，见《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74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⑥ 朱熹：《古史余论》，见《朱熹集》，卷72，3795页，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5，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经学上的造诣和治学旨趣。但由于苏辙以文学之显而立于“唐宋八大家”之林，又以政论之著而成为一代名宰，故其学术成就颇被世人忽略。与世人的冷漠相反，“三苏”父子对自己学术著作的看重，则更有甚于其文学成就。如苏洵为《易》作传，说：“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① 苏辙谓其兄《中庸论》“皆古人所未喻”、《易传》乃“千载之微言”、《论语说》“发孔氏之秘”、《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②，苏辙晚年理定《诗传》等书，更是“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③。就连苏学的反对派朱熹在评价苏轼的经学成就时也曾说：“当时游其门者，虽苦心极力，学得他文词言语，济得甚事？如见识议论，自是远不及，今东坡解经虽不甚纯，然好处亦自多，其议论亦有长处。”^④ 苏门弟子秦观辩驳世人对苏氏的误解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⑤ 这一辩解反映了“三苏”门人对于本师学术器识的自信与尊崇。虽然秦观之说在今天看来有重道轻文的偏颇之处，但“三苏”在经学上的成就的确是不容低估的。因此探讨苏辙《诗集传》的经学思想，不仅有助于研究苏辙的学术

① 苏洵：《上韩丞相书》，见《嘉祐集》，卷13，353页，曾枣庄、金成礼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②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见《栾城后集》，卷22，1421~1422页。

③ 苏辙：《颍滨遗老传下》，见《栾城后集》，卷13，1313页。

④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0，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

⑤ 秦观：《答傅彬老简》，见《淮海集笺注》，卷30，981页，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思想，推而广之，对提请学人关注“三苏”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必要的。

苏辙所处的时代是宋学兴起和发展的阶段，此时政治改革、教育改革与儒学复兴运动同步发生、互相促进。经学怀疑思潮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伴随着北宋中期的学风之变而全面展开。因此《诗集传》的产生又是时代风气使然。众所周知，自孔子创建儒家学派后，经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儒学不仅成为治国之学，有关儒家学说的学术形态——经学也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成为儒生们孜孜以求的对象。但汉儒治经，重传注而守师法，及其失则多拘囿于儒家经典一些细枝末节的繁琐笺注，对于儒学的要旨大义却有所不顾。这种模式经魏晋至隋唐都没有多大改变，其间虽偶有学者试图摆脱先儒传注的束缚，但总的情况仍是“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①。这种章句训诂的旧学风，虽然有为学严谨、重视传统的优点，但也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儒学义理的发挥。因此突破旧的经学传注，进而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清理和研究也就成为儒家学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样，至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在当时社会改革和复兴儒学浪潮的冲击下，儒家学者们基于对汉唐繁琐学风的反对，主张抛开传注，直寻经义，这就形成了一股以疑经惑传为特征的经学变古思潮。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曰：

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156页，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4。

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①

陆游进而指出：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②

对于陆游的这段话，清末皮锡瑞解释说：

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③

台湾学者屈万里先生评论此时风气曰：

北宋初年的学者，对于经学的解释，还谨守着汉唐人的注疏。到庆历年间，风气渐变，像刘敞的《七经小传》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都能独抒己见，不再受

①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45，《四部丛刊》本。

②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190～191页，孙通海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③ 皮锡瑞：《经学历史》，156页，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4。

汉唐人的拘束。……他们固然是怀疑古人经说，而不是怀疑经文，可是，怀疑经文的风气也恰好起于此时。^①

由此可见，当时疑经惑传之风颇盛，而欧、苏等人又都是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学术取向，既是时代风气的反映，又引导着时代风气的发展和演变。同时，疑经惑传与发明经旨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宋儒在这种时风的影响下，“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②，故出现了一种有别于汉儒的新的解经方法和新的经学形态，即方法论上从固守传统注疏到自由解经，经学形态上从汉学传统到宋学传统。吴曾、王应麟、晁公武、陈振孙以及近人马宗霍等对此都曾有所描述：

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③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④

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⑤

前世经学，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经、著书行

① 屈万里：《宋人疑经的风气》，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9卷，1964（3），23页。

② 钱大昕：《重刻孙明复小集序》，见《潜研堂集》，430页，吕友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③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190页，孙通海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⑤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下，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